



修身治国宝典《群书治要》

朱浩熙



文化
传承
与
创新

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著名诗篇《忆昔》：“忆昔开元全盛日，小邑犹藏万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廩俱丰实。九州道路无豺虎，远行不劳吉日出。齐纨鲁缟车班班，男耕女织不相失。宫中圣人奏云门，天下朋友皆胶膝。百余年间未灾变，叔孙礼乐萧何律……”

这首诗描绘的是盛唐开元年间的繁荣景象。小小县城，居住万家，农业丰收，仓库充盈，天下太平，社会安定，交通便利，商品丰盛，四海朋友汇聚都城，一百余年风调雨顺，以礼以法治国，处处政通人和。那么，开元年间，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呢？我们不能不说到一部书——《群书治要》。

一、《群书治要》为唐太宗资政法典

唐太宗(599—649年)，即李世民，唐高祖李渊次子，626—649年在位。18岁随父起兵反隋，李渊称帝后，受封秦王。曾镇压窦建德、刘黑闥农民起义，消灭薛仁杲、王世充等割据势力，626年发动玄武门之变，得为太子，继帝位。常以“亡隋为戒”，任贤纳谏，实行开明政治。历史上，是





一位明君。所谓“秦皇汉武，唐宗宋祖”，唐宗即唐太宗。

李世民即皇帝位后，偃武修文，休养生息，留心治国之道。即位次月，便设立弘文馆，聚书二十万卷，招纳文学之士，汇集天下英贤。朝廷议事后，唐太宗延请众人同入弘文馆，请教治国安邦之策。众英才们平日在馆中轮值，并不能随侍太宗之侧；且古代经典浩如烟海，一人之力难以遍览群书，而且难以得其要领。有感于此，唐太宗即产生编纂《群书治要》的想法，遂颁布诏书，令魏征、虞世南、褚亮及萧德言，将经史百家关于历代帝王治乱兴衰之道，编撰成册。《群书治要》，又名《群书理要》《群书政要》，魏征等人阅读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经典，上自五帝，下迄晋代，撷取经、史、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精华，从一万四千多部、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，博采典籍 65 种，共 50 余万言，编成《群书治要》一书。魏征在序言中谈到此书的价值：“用之当今，足以鉴览前古；传之来叶，可以贻厥孙谋。”

唐太宗对这部书非常满意。“帝爱其书博而要，曰：‘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，公等力也。’赉赐尤渥。”（《新唐书·萧德言传》）又说：“朕少尚威武，不精学业，先王之道，茫若涉海。观所撰书，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使朕致治稽古，临事不惑，甚为劳也，不亦大哉！”（《全唐文·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》）

二、《群书治要》开创贞观之治

唐太宗把《群书治要》作为治国宝典。据《贞观政要》





记载,唐太宗谈到阅读此书感受:“手不释卷,知风化之本,见政理之源。”特令缮写十余部,分赐太子及诸侯王,以作为从政龟鉴。(《群书治要心得》)

《群书治要》开创“贞观盛世”。贞观初年,经济开始恢复,逐渐走向繁荣,一扫隋末因战争破坏经济凋零景象。“(贞观)四年,斗米四五钱,外户不闭者数月,马牛披野,人行数千里不赍粮,民物蕃息。”(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)“又频致稔,斗米四五钱,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,自山东至于沧海,皆不赍粮,而取于路。入山东村落,行旅经过者,必厚加供待,或发时有赠送。此皆太昔未有也。”(《贞观政要》卷一)

“天宝十三年十月,唐玄宗李隆基下令翰林院内部重新编写《群书治要》刊出,所引皆是伦理道德之文。”(据宋代王应麟《玉海》引用《集贤注记》载)

李繁《邺侯家传》曾记,皇上问:“朕欲知有古政理之要,而史籍广博,卒难寻究,读何而可?”回答说:“昔魏征为太子略群书之言理道者,撰成 50 卷,谓之群书理要。”

开明盛世延续 100 多年。到天宝年间,社会依然政治开明,社会文明,经济富足,文化繁荣。“开元二十八年,天下雄富,京师米价,斛不盈二百,绢亦如之。东由汴京,西历歧凤,夹路列店,陈酒饌待客,行人万里,不持寸刃。”(钱谦益注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)唐玄宗天宝五年(746 年),全国 906 万户,5 288 万人。安史之乱后,至唐代宗广德二年(764 年),全国仅有 290 万户,1 690 万人。





三、《群书治要》流传惠及日本

经过唐末战乱和五代十国之乱,宋朝初年,《群书治要》便失传了。《宋史艺文志》便没有《群书治要》的记载。其原因:一是当时此书仅限上层阅读;二是经过动乱及五代战乱,文化遭到严重破坏;三是雕版印刷尚未发达,抄写数量极少。

所幸盛唐时期,《群书治要》流传日本。日本遣唐使将《群书治要》抄本带到东瀛,受到日本天皇的高度重视。历代天皇、太子及大臣将《群书治要》奉为圭臬,作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重要经典。据日本岛田翰《古文旧书考》称:“《续日本后记》载:‘仁明天皇承和五年(838年),天皇御清凉殿,令助教直道宿称广公读《群书治要》。’”日本《三代实录》云:“清和天皇贞观十七年(875年)四月,天皇读《群书治要》。”至唐僖宗时,日本清和天皇仍“与大臣共读之”。日本嘉元四年(1305年)二月二十八日,《群书治要》“以右大办(官名)三位经雄卿本书写点校毕”。

《群书治要》给东瀛带来吉祥,催生日本盛世局面。日本林信敬《群书治要》天明本校正序言中写道:“我朝承和、贞观之间,致重雍、袭熙之盛者,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。”

此书不仅催生大唐贞观之治,而且也为日本带来承和、贞观之治,不能不谓之神奇。

四、《群书治要》千年重回中土

公元十三世纪,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武将军北条实





时(亦称金泽实时),因“好居书籍”,发现《群书治要》后,请中秘书抄写,“以藏其金泽文库”。后来,德川家康得到此书,日本元和二年(1616年)正月用活字排印。此时,全书已缺失卷四、卷十三、卷二十,仅四十七卷了。半年后,印成五十一部,每部四十七册。不幸,德川家康突然去世,印本只分赠其后裔尾张、纪伊两家藩主。流传外边不多。



日本天明元年(1781年),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,有感于《群书治要》未能流布,便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“金泽文库”藏僧人抄本《群书治要》,重新校刊。17年后,日本天明六年(1786年)重印本告成,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。

日本宽政八年(1796年),日本尾张藩主家得知此书在中国失传,于是以五部移送长崎海关掌管近藤重藏,托其转达中华。近藤以一部存长崎圣堂,一部赠諏访社,三部赠唐商馆,由中国商人携回国内。《群书治要》重回中土。

清嘉庆初年,《群书治要》回到中国,每部二十五册。嘉庆七年(1802年),鲍廷博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提到《群书治要》:“此书久佚,仅见日本天明刻本。”稍后,阮元编《宛委别藏》,便编入《群书治要》,题曰:“《群书治要》五十卷,原缺卷三、卷十三、卷二十。唐魏征等撰,日本天明刊本。”后来,《连筠移丛书》、《粤雅堂丛书(三编)》等从《宛委别藏》中辑入《群书治要》,世人惊为秘籍,为清人





校刊典籍发挥很大作用。民国年间,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日本天明本出版,涵芬楼还以《宛委别藏》本为底本影印出版。

然而,《群书治要》虽然重回中土,却并未受到执政者应有重视。此书仅仅作为学者校勘、辑佚古籍的参考,知者甚少,未发挥经世治国之大用。

五、《群书治要》治国宝典重光

20世纪90年代,我国原驻日本大使符浩先生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天明版《群书治要》。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、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阅后,充分肯定这部书的巨大价值,于2001年2月25日为《群书治要》题词:“古镜今鉴。”2004年,由吕效祖先生点校的《群书治要》点校本出版。此书逐渐在高层领导和学界享有盛望。2009年,温家宝总理出访西班牙时,特别引用《群书治要·昌言》中的话激励海外学子:“安危不二其志,险易不革其心”。

2010年底,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净空教授看到这部书,如获至宝,即委托世界书局翻印流通,并委托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心对此书加以节录,预计10年,每年节录360条,译成白话,并翻译成各国文字和语言,在世界流通。

2011年7月,吕效祖、赵宝玉等主编、将原文翻译成白话文的《群书治要考译》在团结出版社出版。2012年5月,《群书治要译注》全28册在中国书店出版,《群





《群书治要360》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,并补录了天明本亡佚的三卷。同年9月、10月,萧祥剑《群书治要心得》、刘余莉《品读群书治要》在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。

《群书治要》受到海内外高层领导、专家学者以至读者的广泛关注。2013年5月,净空教授向19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使和教科文组织,赠送1000套《群书治要》。他说:“《群书治要》是了不起的东西,我们今天在国外介绍给外国人,我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,我说是人类祖先传统的文化,而保存最好的,保存最完整的。”“我劝外国人要学文言文,文言文学会之后,你可以直接去读‘四库’,‘四库’是祖宗留下来的瑰宝。全世界的人人人有份,这不是哪个国家、哪个民族的,人人有份!希望全世界人都学,我希望30年之后文言文是世界上通用的语文。”



六、《群书治要》大体内容管窥

《群书治要》以儒家思想为主导,依照经、史、子的次序排列。经:节录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春秋左氏传》《礼记》《周礼》《周书》《国语》《韩诗外传》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孔子家语》等十二部经典,内容均为与修身理政有关的嘉言懿行。史:节录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《晋书》等体现朝代治乱兴衰的史实和君臣言论。子:则从《六韬》《阴谋》《鬻子》《管子》《晏子》《司马法》《孙子兵法》《老子》《鹖冠子》《列子》《墨子》《文子》等四十多种典籍中节录,涵盖儒家、道家、墨家、法家、兵家、杂家等思想流派,核心为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精萃。





《群书治要》重在修身治国，内容分六部分：君道、臣术、贵德、为政、敬慎、明辨。每个部分又分很多细目，如君道又分为修身、敦亲、反身、尊贤、纳谏、杜谗邪、审断。修身又分戒贪、勤俭、惩忿、迁善、改过。其他条目也是如此。

关于君道。首先，修身戒贪。不能贪功、贪名、贪利、贪色、贪图享受，等等，“外作禽荒，内作色荒，甘酒嗜音，峻宇雕墙。有一于此，未或弗亡。”（《卷二·尚书》）提历倡节俭欲勤俭，“历观有家有国，其得之也，莫不阶于俭约；其失之也，莫不由于奢侈。”（《卷四十七·政要论》）其次，敢于担责，反省过错。“朕躬有罪，无以万方，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”，“有过则反之于身，有善则归之于民”（《卷三十二·管子》）。看到有人犯罪，首先是检讨自己，责任在领导失教。最近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引用《群书治要》中的话，批判奥巴马西点军校讲话“美国要领导世界一百年”：“禹汤罪己，其兴也勃焉；桀纣罪人，其亡也忽焉。”（《卷四十七·政要论》）再次，重视察人。不人云亦云，认真考察。“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，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，则多党者进，少党者退，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，忠臣死于无罪，邪臣以虚誉取爵位，是以世乱愈甚，故其国不免于危亡。”（《卷三十一·六韬》）

关于臣术。为臣要修身立节、尽忠、劝谏、举贤。“杨震字伯起，弘农人也。迁东莱太守，道经昌邑，故所举茂才王密为昌邑令，谒见，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。震曰：‘故





人知君,君不知故人何也?’密曰:‘暮夜无知者。’震曰:‘天知神知,我知你知,何谓无知?’”(《卷十三·后汉书三》)“有六正则荣,犯六邪则辱。”(《卷四十三·说苑》)所说六正:圣臣——高瞻远瞩、防患未然;大臣——虚心尽意、扶善除恶;忠臣——夙兴夜寐、进贤不懈;智臣——明察成败、转祸为福;贞臣——恪尽职守、廉洁奉公;直臣——刚正不阿、敢争敢谏。六邪:具臣——安官贪禄、不务公事;谀臣——巴结谄媚、曲意奉迎;奸臣——巧言令色、嫉贤妒能;谗臣——巧言如簧、挑拨离间;贼臣——专权擅势、结党营私;亡国之臣——幕后指挥、兴风作浪。

关于修身。强调立德正心,重在孝亲。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(《大学》)修身者,做人也。孔子将“孝”称为修身的“至德要道”。“孝者,德之本也,教之所由生也。”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,孝之始也。立身行道,扬名于后世,以显父母,孝之终也。夫孝,始于事亲,中于事君,终于立身。”(《卷九·孝经》)衡量人的德才,首先看是否孝顺父母,有德即量才,不孝即无德。无德之人,其才便不足观。汉文帝孝母,当皇帝后还是亲自为母亲煎药。《弟子规》“亲有疾,药先尝,昼夜侍,不离床”就是讲他的故事。汉文帝实行以孝治国,选拔人才实行“举孝廉”。其臣是一批孝子。历朝历代,忠臣出自孝子。“资于事父以事母,而爱同;资于事父以事君,而敬同。故母取其爱,君取其敬,兼之者父也。故孝事群





则忠,以敬事长则顺。忠顺不失,以事其上,然后能保其禄位,而守其祭祀,盖士之孝也。”(《卷九·孝经》)士,相当于今天公务员。国家如此,企业也是如此。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并不是贬损女子的。原对联是:“男子有德便是才,女子无才便是德。”男子有道德,孝顺,就是有才。可见德性的重要。女子谦卑,说自己才能不行,正表明她德性好。一以贯之,不能曲解。

关于因果。古圣先贤早就认识到因果关系,谆谆告诫人们,为善则祥,为不善则殃。这是规律,不是迷信,不是宗教。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;积不善之家,必有余殃。”(《卷一·周易》)“惟上帝弗常,作善降之百祥,作不善降之百殃。尔惟德罔小,万邦惟庆;尔惟弗德罔大,坠厥宗。”(《卷二·尚书》)“存亡祸福,皆在己而已。天灾地妖,弗能加也。”(《卷十·孔子家语》)“利天下者,天下亦利之;害天下者,天下亦害之。”(《卷四十九·傅子》)“见祥而为不可,祥必为祸。”(《卷四十·贾子》)古代圣贤告诫人们,要行善积德,才能远离灾祸。这真是肺腑之言。无数历史事实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

七、《群书治要》历史文化价值

近几年,海内外《群书治要》热持续升温。2013年4月20日,香港《群书治要论坛》开幕;同年8月,北京在西山举办首届《群书治要》师资培训班。之后,各级党校陆续开讲《群书治要》课。南京大学、湖南衡阳等地陆续开办《群书治要论坛》。现在,《群书治要》被奉为一部高





层热捧、学界热读、中央党校学员修读,比《资治通鉴》更为全面、更为系统、更为精要、更为权威的修身治国宝典。

《群书治要》是匡政巨著,治国纲领,体现出古圣先贤的智慧和治国理念,是中国古代宝贵的管理科学,对我们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指导意义。魏征在《群书治要》序言中所说:“用之当今,足以鉴览前古;传之来叶,可以贻厥孙谋。”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,不仅属于中国,而且属于全人类。我们认识到它的巨大价值,好好学习,好好继承,让治国科学理论放射出穿越时空的光辉。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!”

这部书佚失千年,失而复得,是中国文化之大幸。难能的是,《群书治要》摘录的原著五代之后便已失传,实为珍宝,如《尸子》《崔实政论》《昌言》《典论》《刘廙政论》《蒋子万机论》《政要论》《体论》《典语》《傅子》《袁子正书》等书也失而复得,更提高了《群书治要》的文化价值。

金子总会发光。《群书治要》是一部金典。它浓缩了古圣先贤最精辟的修身齐家治国的教诲和智慧,对现代人安身立命和创业兴家至关重要,真正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政管理科学,虽被埋没冷落一千多年,一旦让国人认识其巨大价值,必将重放光辉,点亮更多人的心灯。其中思想对领导干部如何为政,企业家如何治企,乃至个人如何修身齐家,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。《群书治要》体现的治国思想,对于如何构建和谐社





丰富建设中国特色,化解世界冲突,实现民族复兴大业,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。

当代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,许多都能从《群书治要》找到答案。但是,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借鉴前人的智慧,长期艰苦努力,才能实现十三亿人民的“中国梦”,完成中华民族复兴大业。“曾子曰:‘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,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?死而后已,不亦远乎?’”(《卷九·论语》)

让我们共同努力!

(本稿由徐州市社科联推荐)



朱浩熙,沛县人,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,曾任徐州市委副秘书长、市委办公室主任,市教委主任、教工委书记、教育局局长,九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、副董事长、常务副院长。著作有《彭祖》《蒋天枢传》。

